

■新作聚焦

乔叶非虚构小说《拆楼记》

有意义的“冒犯”

□张莉

《拆楼记》是乔叶的非虚构小说，2011年《人民文学》曾分两次发表。作为与许多新闻报道、图片影像有很大区别的纪实性作品，乔叶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姐姐一家所面临的拆迁，在知道要拆迁之前，各家客户争先恐后地盖楼——盖楼意味着被拆迁时分的赔偿金会更多。当然，下有对策，上又有新政。不服从拆迁、扰乱拆迁秩序者，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都将受到牵连。可是，马上离婚的夫妻不能再有连带责任了吧？兄弟如果登报脱离亲属关系呢？“拆迁”在乔叶笔下不是静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标本，而是动态的，各方都像是坐在跷跷板上，你来我往地进行利益的博弈，用书中频繁出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

“拆迁”是这个时代“人际政治”的风眼。在写《拆楼记》的过程中，乔叶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什么是什么人。《拆楼记》里每个人都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拆迁世界由被拆迁户、拆迁的官员、记者、公务员、上访者等各种利益相互缠绕的人群共同构成。小说采用了大量的注释和引用，将各种新闻、报道、歌

曲、谚语引述过来，同构了这个时代纷繁复杂的“拆迁”语境。《拆楼记》中的公务员既陌生又熟悉，他们有“像狐狸一样的精明，间谋一样的戒心”，他们会“以情动人”，也会“以权压人”；他们怕上级主管，也怕外地记者。在作品中，正是地方官员“怕曝光”的心理，才使姐姐的女儿在拆迁人员进屋后用暗地摄像的方式取得了资料，交给记者，进而对拆迁人员进行要挟，获得了6万块钱的拆楼费用。

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拆楼记》使读者看到，拆迁事件中的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各有立场。他们为什么要多盖房，为什么坚持不拆楼？6万块钱，这是一个农民多少年的劳动所得？拆迁办为什么要大量支出宣传费？《拆楼记》中每个坚持到最后的村民都是最能算计、锱铢必较的人，是希望自己利益不被侵害的人，也是试图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算账在文字中也许是无趣的，但算账恰恰也最有说服力，那明明白白的算账正是明明白白的利益。

《拆楼记》中有各种各样的“钉子户”，或有作战到底、以死相拼的决心，或

的光脚人。一般的光脚人，哪有那么强悍呢？更多的光脚人是弱的，他们看见穿鞋的人，怎么敢伸出自己的脚？”在无数“光脚”的人们的价值观里，在这个时代，只有吃亏、只有妥协、只有怯懦才会保平安，所以，他们只能对另一种账目视而不见。

《拆楼记》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拆迁户：会算账的、不会算账的，以及聚光灯下的“钉子户”和那些因恐惧而“早搬迁”的人。正如李敬泽对此书的评价：“看到灯光之下和灯光之外，看到前台和后台，看到白天和夜晚，看到那些拆迁和被拆迁的人们，他们真实的、赤裸裸的动机、利益和情感，不是对着记者、对着麦克风所说的，而是他们正在做的。”《拆楼记》由此成为庞大社会戏剧的一个脚注，一种边缘的思想和争辩”。因为眷顾那些不会算账人们的所思所想，《拆楼记》写出了这个时代最隐密的、被我们习焉不察的精神气质。

不得不提到《拆楼记》中的作家形象，这里的“我”比乔叶以往任何小说中的叙述人都更为本真、不矫饰，“我”与姐姐共同合谋，斤斤计较，出谋划策，既参与其中又出于其外，用尽各种关系使姐姐多拿到6万块钱。因为放弃了“我”作为作家形象的塑造，拆迁世界变得更为暧昧、矛盾、机关重重，也许眼前这些事实并不是读者想要看到的那个“拆迁”事件，但它无疑更接近现实的真相。

乔叶在非虚构写作中将“我”放进去的尝试令人赞赏，但也会使人诟病。这个在《读者》杂志拥有诸多大众读者的作家有可能因《拆楼记》而冒犯她的许多“粉丝”，但她的写作也会因这种冒犯而发生重要的、具有转折意义的蜕变。

■创作谈

《拆楼记》创作初衷是因为看见。其实一直在看见，但一直觉得自己写不了。有一次，我跟朋友说自己没能力写这个，朋友当即就说：“很多时候，勇气就是能力。”我顿悟，明白自己是潜意识深处知难而退。直到2010年受到《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风潮的引领——这是又一初衷，恰巧又近距离地遭遇了姐姐的拆迁事件，我近乎强迫地让自己把目光集中在这个事件之上，在克服了心理障碍和写作障碍之后，就有了它。

作品发表之后，有朋友觉得事件本身不够扎眼、不够典型，问我：“关于拆迁的事有那么多流血的、自焚的、火爆的，你怎么不好好写写那些？是不是怕不好发表？”我没有想到发表问题。我没有那么远见，没有那么聪明，也没有那么胆小。我之所以写了这样一个事件，是因为我无可选择：我碰上的就是这样的事件，我必须忠于自己的眼睛和心灵。

写完之后我才明白，我写的是怎样的一个样本——是的，它不是最扎眼的拆迁事件，但是，它是最常态的拆迁事件。没错，我们的国家是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在这里，拆迁事件如此之多，多到媒体已经目不暇接，必须得流血自焚才能吸引他们的视线，可那些有资格上报纸、电视和网络的火爆事件，它们的数量，比起我写的张庄事件来说，总还是微小的。在拆迁事件的整体格局中，火爆事件再多，也不过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张庄这样的：磨磨唧唧、腻歪歪、吭吭哧哧、进进退退，拆的和被拆的都在泥地里较着劲儿，摸爬滚打……没有媒体去关注他们，他们自己也沉默着。我写的就是这样沉默的大多数。

在写作时，我没有想过文体问题，只是觉得这么写是我的最好选择。《人民文学》在发表时，把它定为“非虚构小说”，我想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的小说化。在写作的时候，我选择了用小说化的技巧来优化我想传达出的那种真实感，使我想传达出的真实感能够以一种更集中、更有趣也更富有细节和温度的方式来展现给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看到在这样的事件中——这样很容易把具体的人心和人性遮蔽的事件中——活生生的人性和人性。总之，就是想用小说这个利刃插进事件的骨缝中，在尽力解剖巨牛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叙述效果更为趋真。《人民文学》在卷首语上这样推荐：“小说”而“非虚构”，大概会让人糊涂，但有时糊涂是难得的，不顾体裁的樊篱，探索贴近和表现生活的新路径，这才是要紧。——对于《拆楼记》，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者纪实作品定位，我更喜欢“非虚构小说”这样的称呼。

其实，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新的称谓其一点儿都不新了，在美国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传统。它暧昧不明，但它最吸引我的魅力也正在于它的暧昧不明。小说难道就必须是纯虚构？其他文体难道就必须不虚构？文学样式之间就必得楚河汉界、水火不容？自从因为“非虚构小说”被质疑后，我就很喜欢吃那道叫“素鸡”的菜，它是用豆腐皮做的，却有鸡肉的口感和味道。我边吃边疑惑：人们很乐意接受“素鸡”这样的菜，为什么却不愿接受“非虚构小说”这样的词呢？

我常常觉得，文学本身并没有牢笼，画地为牢的人多了，也便有了牢笼。

有记者问：作家一般都深藏在作品幕后，虚虚实实，让人真伪难辨。面对真相，暴露真实的自我，往往令人难耐或者难堪。《拆楼记》作为非虚构，一定是自我暴露最多的作品，选择把自己全盘托出，是不是需要克服很多心理障碍？

我答：你这种判断，我不敢认同。一个真正的作家，在生活中或许虚虚实实真伪难辨，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是最赤裸的。每一个字都在讲述他自己，无论是什么文体，什么故事。所谓的虚构和非虚构，不能用简单的对应关系来画线：虚构就是全假，非虚构就是全真。做这种对应很容易，但也粗暴。作为非虚构标记的作品，《拆楼记》以“我”为叙述角度，但是，请不要把作品里的“我”和作品背后的我画上对应线。在《拆楼记》中，“我”最明确的叙述身份就是一个乡村之根还没有死的逃离者，一个农妇的妹妹。我暴露的，只是这个层面的自我。

这个叙述角度，当初寻找的时候有一定的障碍，找到感觉之后，就很自如了。当然，此处的“我”是卑微的，但这正是我的必然选择。我有我的道理：只有站到低处向上看的时候，层次才会最丰富。如果是一个正气浩荡、高高在上的作者去面对这样的是怎样？我想，他除了那种最通常的正义词严之外，恐怕也表达不出别的什么。而我最想避开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公共话语，说出我的“一个”。

在创作过程中，我有意克制着自己的道德立场，那种所谓的道德立场，不是冷眼旁观，就是高高在上。我做不到，也站不稳，不仅因为我的乡村之根还没有死，也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农妇的妹妹，更重要的是：我一向从心底里厌恶和拒绝那种冷眼旁观和高高在上。我对自己说：那就和他们混在一起吧，尽管混在一起让我很不舒服，也不可能舒服，但我只能把自己投身到他们中间，投身到他们的泥水里，然后再去说别的。我尽量客观地裸露我所看到的事实，还有事实中的我自己，其他的就交由读者。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立场吗？

作品发表后，很是挨了一些骂，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我知道有很多人习惯站在各种阵营里说话，“底层代言人”说“我”太理解官员，一些官员说“我”和“刁民”混在一起，知识分子说“我”对亲人的态度太残酷，更可恨的是“我”为了私利如此折腾，没有去谋求公共利益，反而成了“公义”的破坏者……好吧，他们都有理。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像一只蝙蝠，在禽和兽之间飞来飞去，可以说既是禽也是兽，也可以说既非禽也非兽。

当然，也有很多人给了我温暖的肯定和褒扬，比如有一位叫“一池云锦”的网友就说，无序、划界不清，有漏洞的法度之外的混乱，宏大理想的照耀下，小心翼翼的活法。百姓的难、百姓的牺牲、百姓的软弱、百姓自身的探照，浩大的中国式一切刀、仓皇的人心……她的话不是很有逻辑，但我明白她，她也明白我。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种明白最珍贵。

■新作快评 迟子建《他们的指甲》（《作家》2012年第6期）

迟子建短篇小说新作《他们的指甲》（《作家》2012年第6期），写一个误会以及一个本地寡妇和一个外来打工者之间的爱慕。小说所写的故事，没有任何传奇色彩，没有任何爆料的成分，不靠情节猎奇取胜。但这篇小说给人留下的印象可以用这样的词汇概括：人物美、人情美、心灵美、风物美。好的短篇小说，时常具有诗的意义，读后让人感到意蕴无穷，迟子建这篇小说便是如此。

迟子建坚持自己的艺术操守，不为写长而写长，不为吸引看客而猎奇，更不将平常的故事有意弄得神神秘道。前者是老生常谈，后者要靠实力做后盾。写作实力表现为：能将可编得更新奇的情节保持在本色之内，同时写出情节之外的内涵。艺术求新不一定是求故事之新，而在千辛万苦的心灵化体验，描述的洞穿性效果。迟子建的《他们的指甲》能重新让平凡的生活再次激起我们的回味，具有不可复制性，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平常故事如何成为美的小说，简单的故事如果成为丰饶的小说？首先，按照汪曾祺的说法，“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迟子建这篇小说语言是具有诗性美的，进行语言品味的空间颇大。其次，按照沈从文的说法，“要贴到人物写”，故事不论繁简，都要禁得住分析，需要为人物服务，透露人物的境遇和心情。

最后，小说选取人物必须具有时代典型性。在《他们的指甲》中，迟子建也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个人”都是“时代的”，所有“民族”的都是“世界的”，所以，实现“个人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实现“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需要作家挖掘普遍的人性，摸准时代的精神脉搏。小说男女主人公的身上隐含着很多故事，他们个人历史中的小秘密和隐痛，均是时代特产。两个善良、历经沧桑的人，相互主动选择了对方，小说就是从这里切入的。

《他们的指甲》敢于省略，小说的主体书写部分并不为后几节的出现做铺垫，但又确实是某种铺垫。所谓“宕开一笔”，不是偶然，是偶然中的必然。当如雪开始回忆她经历的几个男人时，我们就知道她的每一次可能都是像这一次一样，走向一个男人和自己的忧伤。不同的指甲留下的况味，于她是绝对个体的体验，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也是如雪作为感受者的时代和世界的一部分。小说所能写的，其实也只能是生活很小的一个局部。

小说家的艺术操守

□李昌麟

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有多长？这一疑问始终困扰着古往今来的文学家。庞瑞垠70多岁依然笔耕不辍，一年内就拿出了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况且，写作这样的作品必须要做大量的实地采访和文案准备。这就使大家要问，这何以可能？

在我看来，除去文学创作的一般准备和身心条件外，一个作家是否建构了自己的创作个性，是否拥有了自己文学的生产方式、话语方式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一位作家永远处在寻找之中，永远在为自己的匮乏焦愁，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写作动作该何以为继，那他终究有难以为继的一天。相反，如果他确立了自己的思想与审美的基地，找到了自己取之不尽的富矿，使自己一直处在一种连续状态的创造活动之中，那他的创作将与他的生命同在。庞瑞垠的创作虽然文本不同，题材不一，但始终坚持着坚定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自身知识结构、人生经验和思想风格相匹配的对现实、历史和政治的追寻和探究的热情，以及一种大开大阖的宏大的叙事风格。

庞瑞垠的文学地位是以小说奠定基础的。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短篇小说《东平之死》曾引起广泛的讨论，庞瑞垠从美学与哲学的高度开始了对历史的重新叙述。他首先排除对历史的概念化表述和想象，试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次，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人，展示人性，描写人物在特定历史场景中的情感与冲突。《东平之死》写作前后，庞瑞垠还创作了《恍惚》《朦胧》等中短篇，以及《少女远行归来》《女模特儿之恋》《漂泊少女》《红尘男女》等长篇小说，都是对现实的近距离观察。他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中抓取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现象，塑造在急剧动荡时代里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追寻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心理，试图为迷茫的人们提供解读社会的路径。当然，为庞瑞垠赢得更多声誉的还是那些巨大体量的长篇历史小说，如《危城》《寒星》《落日》《逐鹿金陵》，以及三部曲《秦淮世家》。这些作品将作者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展示得淋

■评论

出没纪实与虚构中的老精灵

□汪政

漓尽致。自90年代往后，庞瑞垠大量创作长篇小说，巨大的叙事空间使作者能够游刃有余地将广阔的历史场景、众多的历史人物、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和百科全书式的历史风情一一安排。与这种历史的广度相得益彰的是历史的深度。庞瑞垠是地道的南京人，对这座生他养他的城市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他的历史小说基本上都是写南京、写民国的，是打井式的。庞瑞垠深刻解读民国复杂的政治关系，并对各种力量博弈背后的社会选择具有准确把握。此外，对历史的超越以及面对人与历史时的文化关怀与诗性感喟，更使庞瑞垠的历史叙事具有了不一般的情怀。

如果说庞瑞垠的虚构是由现实进入历史的话，那么他的纪实则是由历史进入现实，并通过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而使自己成为这一体裁领域中的重要作家。庞瑞垠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与他的小说一样，也是从敏感的社会现象入手的，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八九十年代的创作离现实比较近，那时的庞瑞垠与中国的普通民众一样，面对的是目不暇接的新生事物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这些作品给时代留下了见证和档案，但不可避免是粗线条的，没有显示出作家思想的优长。进入新世纪以后，庞瑞垠的历史意识有了用武之地，他的政治热情又一次以文学的方式开始释放。他放慢了自己的脚步，选择了回望的姿态，选取在中国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地方与事件，一方面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对这些故事背后的意义做出自己的解释，这就有了《光明行》《华西纪事：2006回望吴仁宝》《大道无痕》等长篇报告文学，它们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一个立体的、“圆形”的人物形象。在庞瑞垠的笔下，秦振华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成长的人、发展的人、一个内心与行为都无比丰富的人。庞瑞垠是在最大限度地发现人物、还原人物。所以我们看到了秦振华的智慧与“木讷”、刚强与柔软、大胆与“查横”等许多相辅相成的性格。其次，作家是在环境与关系中描写人物的。庞瑞垠全方位地、历史地展现了张家港这座具有特别意义的城市在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的独特地位。秦振华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人物，是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她的文化密切相关的人。人与地方、与城市是相互塑造的。通过城市写人物，通过人物写城市，相互阐发、相互借力，从而写出了人物的风采，写出了城市的精神。这是一种技法，也是一种唯物史观。这种唯物史观还表现在作家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与描写上。这部作品不只写了秦振华一个人，更准确地说，这部报告文学写了一群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人物群雕。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是这一伟大历史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他们与秦振华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秦振华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而这些人也通过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秦振华不同的内心世界与应对世界的方式，由此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印象与评价。第三就是发现，即作家对人物的评价。在这部报告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他的话语、他的认识。所以，这部报告文学不仅是一个曾经的改革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家。秦振华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人物，是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她的文化密切相关的人。人与地方、与城市是相互塑造的。通过城市写人物，通过人物写城市，相互阐发、相互借力，从而写出了人物的风采，写出了城市的精神。这是一种技法，也是一种唯物史观。这种唯物史观还表现在作家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与描写上。这部作品不只写了秦振华一个人，更准确地说，这部报告文学写了一群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人物群雕。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是这一伟大历史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他们与秦振华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秦振华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而这些人也通过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秦振华不同的内心世界与应对世界的方式，由此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印象与评价。第三就是发现，即作家对人物的评价。在这部报告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他的话语、他的认识。所以，这部报告文学不仅是一个曾经的改革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家。

在《光明行》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作家对江阴现象所作的思考。这里有对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江阴人经济行为的阐释，有对江阴“制度创新”的研读，也有对领导层角色的转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的分析，还有在对底层困难群体探访同时对江阴“富民工程”的肯定。现代化的理性思维是庞瑞垠解析江阴的支撑，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支撑，使得这部作品拥有了时代理念的高度。《华西纪事：2006回望吴仁宝》可以看做是《光明行》的姊妹篇。这次庞瑞垠将镜头对准了人，他的思考放在了对人物形象意义的剖析和把握上。吴仁宝现象的背后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在作者看来，一切皆来自于吴仁宝农民式的智慧，是他哲人般的思想、敏锐的政治嗅觉、现代的经营理念，以及他善于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规避风险、果敢行动的个性与品质。《大道无痕——江苏铁路百年变迁史》再次体现了作家的历史识见与政治智慧。作者对政企改革的评说，不为时见左右的“高铁见闻”，以及对铁路史上争议人物的客观叙述等，都体现了这一点。作品中的“我”是个特立独行的叙事人形象，他使作品的评论极为清晰而有力。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记全国优秀市委书记秦振华》是庞瑞垠最新的长篇报告文学，他又一次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影响性人物作为书写对象。将这部作品与以往对秦振华的报道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有这样几个不同的地方。一是它给了我们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一个立体的、“圆形”的人物形象。在庞瑞垠的笔下，秦振华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成长的人、发展的人、一个内心与行为都无比丰富的人。庞瑞垠是在最大限度地发现人物、还原人物。所以我们看到了秦振华的智慧与“木讷”、刚强与柔软、大胆与“查横”等许多相辅相成的性格。其次，作家是在环境与关系中描写人物的。庞瑞垠全方位地、历史地展现了张家港这座具有特别意义的城市在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的独特地位。秦振华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人物，是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她的文化密切相关的人。人与地方、与城市是相互塑造的。通过城市写人物，通过人物写城市，相互阐发、相互借力，从而写出了人物的风采，写出了城市的精神。这是一种技法，也是一种唯物史观。这种唯物史观还表现在作家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与描写上。这部作品不只写了秦振华一个人，更准确地说，这部报告文学写了一群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人物群雕。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是这一伟大历史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他们与秦振华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秦振华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而这些人也通过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秦振华不同的内心世界与应对世界的方式，由此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印象与评价。第三就是发现，即作家对人物的评价。在这部报告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他的话语、他的认识。所以，这部报告文学不仅是一个曾经的改革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家。

拆拆《拆楼记》

□乔叶

这就是庞瑞垠一个人的文学史。他出没于纪实与虚构之中，游走于现实与历史之间。与许多老而趋淡的作家不同，在年逾古稀之后依然能写出如此刚健华彩之作，实在令人钦佩。